

H 闲话文人 张光华

冰心梁实秋的友谊



冰心

梁实秋

冰心与同时代的很多男作家都有君子之交的友谊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,冰心的文章很少提到梁实秋。而在80年代之后,梁实秋在冰心的笔下屡屡出现,这时,我们才知道,原来这两位文坛名宿之间,也有着“不比寻常”的友谊。

冰心与梁实秋的初识,是在1923年1月冰心的新诗《繁星》《春水》出版后,风靡文坛,受到很多文学青年的喜爱,可是梁实秋却不以为然。1923年7月梁实秋即将赴美留学的前夕,他在《创作》周刊上发表了《〈繁星〉与〈春水〉》一文,对冰心的《繁星》与《春水》两部小诗集做了批评。那时两人尚无一面之缘。

梁实秋这样告诉读者:“冰心女士是一个散文作家,小说作家,不适宜于诗;《繁星》《春水》的体裁不值得仿效而流为时尚。”梁实秋的这种诗论当然是一家之言,但在文坛上却是一篇醒目的反调文章。冰心当然也读到了。当时,冰心在文坛上的声望要比梁高得多,被梁批评得一无是处的小诗,正成为很多文学青年模仿的对象。可想而知,梁的这一大篇宏论是很难让冰心服气的。

那篇文章发表后没几天,梁实秋就踏上了去美国的轮船。在这艘船上,经许地山的介绍,他认识了自己刚批评过的冰心。当时他对冰心的印象是,“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,冷冷的好像要拒人千里之外”。

到美国后,梁实秋与冰心的交往逐渐多了起来。梁实秋发现冰心“不是一个恃才傲物的人,不过对人有几分矜持,至于她的胸襟之高超,感觉之敏锐,性情之细腻,均非一般人所可企及”。从此,两人开始结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友谊。

不久,在波士顿一带学习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在当地“美术剧院”演出了英文版《琵琶记》,剧本由顾一樵改写,梁实秋翻译,梁实秋在剧中饰蔡中郎,谢文秋饰赵五娘,顾一樵演宰相,冰心演宰相之女,演出轰动一时。

两人留学回国之后一度断了联系,直到抗战爆发之后才又重逢。

1940年,梁实秋过生日,冰心应邀参加“寿宴”。酒过三巡后,梁实秋忽然研墨展纸,索要冰心的字。那天冰心喝了一点酒,心境特别好,便提笔欣然写下:

一个人应当像一朵花,不论男人或女人。花有色、香、味,人有才、情、趣,三者缺一,便不能做人家的要好的朋友。我的朋友之中,男人中算梁实秋最像一朵花,虽然是一朵鸡冠花,培植尚未成功,实秋仍需努力!

梁实秋拿到这幅字后极为珍爱,后来一直把它带在身边,直到他在台湾病逝。

抗战胜利后,冰心随丈夫吴文藻去了日本,在高岛屋的寓所里,还特意挂了梁实秋送她的一幅字。1951年,冰心夫妇回到祖国,定居北京,而梁实秋于1949年6月去了台湾。由于海峡两岸局势紧张,两人因此中断了联系。“文革”期间,梁实秋听说“冰心和她的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了”,这一消息让他非常悲痛,他写了一篇《忆冰心》,用细腻平和的笔触,回忆了两人几十年的友情。

1972年春,梁实秋收到伦敦凌叔华的来信,才知冰心依然健在。而后来,这篇文章也辗转到了冰心手里,她看了十分感动,立刻写了一封信,托美国友人转给梁实秋。信中说:那是谣言,感谢友人的念旧,希望梁实秋能够回来看看。梁实秋感慨万

千,欣慰之余,又提笔写了更正文字,并将文章收入散文集《看云集》中。

冰心期待着梁实秋能回大陆来看看,结果等待而来的不是离开家园40年的风雨故人,而是梁实秋于1987年11月3日在台湾病逝的噩耗。令人深感痛惜的是,梁实秋原拟第二年回大陆探亲访友。当冰心从梁实秋在北京的女儿梁文茜那里得知旧友逝世的消息后,十分痛心。这位当时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,在短短一个月时间里,和泪写了两篇悼念文章:《悼念梁实秋先生》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,《忆实秋》发表在《文汇报》上。

晚年冰心出版的《关于男人》一书里说:“我这一辈子接触过的可敬可爱的男性的数目,远在可敬可爱的女子之上。”在这本集子中,收录了那两篇写梁实秋的文章。而当梁实秋的遗孀韩菁清女士到北京拜访冰心时,冰心在悲痛中说:“实秋是我的一生知己。”

H 流金岁月 明斋 郑振鹏先生

遥忆三十三年前,余修完大学专业课程后,年仅弱冠即步入社会。初为人师,踌躇满志,不愿误人子弟,务必精益求精,转益多师,教学相长,人以新秀许之,颇露峥嵘气象。当是时也,余不谙世事,性情孤高,心雄万夫,桀骜不驯,虽多有睥睨群侪之举,而心中亦有服膺之人,其中最为服膺者,惟学校郑振鹏先生。

时先生已年逾六旬,中等身材,体态微胖,慈眉善目,气宇轩昂,其儿女均不在身边生活,只有一位孙辈随其读书,承欢膝下。每日晚间,寂寂人定,星光闪烁,夜风送爽,辄见先生与夫人从居住的平房里推门而出,一前一后,沿着校园曲径稳步前行,一圈一圈,脚步坚实而笃定,偶有交谈,亦轻声细语。

“苗大姐,该往回走了。”大约一个时辰之后,先生便轻声唤其夫人道。

“好的。郑君,你前面行。”是苗大姐甜美的声音。

于是,二人便返回居所,仍然是一前一后,脚步稳健,遇人领首而笑,从不刻意寒暄。先生是世家子弟,就读大学期间即已成婚,从此夫人苗大姐便陪侍左右,不弃不离,恩爱伴随。诗书门第,礼数周全,恩爱逾常,卿卿我我,还表现在相互的称谓上,先生终生敬称其夫人为“大姐”,而其夫人则终生以“郑君”“郑郎”回应。君子风度,名士做派,放在今日,绝对可以成为一道风景。

后来,学校号召青年教师随堂听课,多向老教师请教学问,学习授课经验,余首选者即郑振鹏先生。每次前去听课,见先生左手持一册教学用书,右手捏两支白色粉笔,走上讲台,师生问候如仪,然后开始讲课。先生所讲授者为高中三年级历史课程,课堂之上,提纲挈领,要言不烦,循循善诱,有问有答。答对者予以褒赞,答错者及时订正,一章一节,思路清晰,语言流畅,动听悦耳,或幽默风趣,或严谨不苟,关键处切中肯綮,重要处剖析精准,繁琐处抽丝剥茧,难解处条分缕析。一堂课下来,尽管汗珠布满其额头,而态度却极为和蔼,听讲者如沐春风,讲授者亦状极满意。最妙的是先生讲课从来不看教案,严格地说也从来没有教案,满腹经纶,汨汨而泻,排列有序,不容稍误。后来,知情者悄然告诉余等,先生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毕业于国立河南大学文史学院,曾先后师从冯友兰、段凌辰、嵇文甫、范文澜诸位大家,腹有诗书,吞吐才学,融会贯通,自成一家,下的是真功夫,得的是大学问。尽管先生上课不拿纸质教案,但也从不掉以轻心,而是认真准备,绝不姑且,厚积薄发,博约相济。每日晚间,先生负手独行,夫人陪伴左右,旁若无人,状极亲密,风姿翩然,潇洒自如,作野鹤闲云状,其实就是在准备次日的功课,章节要义,重点难点,先后次序,以及紧要之处,一一成竹在胸,面面考虑周详,然后才弛然而

卧,高枕无忧。此种习惯,历数十年从不稍加变动,而教学效果极佳,其平生弟子云集,学界交口称赞,曾位居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、河南省历史学会副会长之职,大家风范,名士气度,绝非浪得虚名也。

八十年代初期的一个冬日,适逢周末,大雪纷飞,瞬间山河皆白,惟松柏苍翠,冬青吐绿,尚有勃勃生机。余踏雪归来,走进校园,但见校道之上行人匆匆,均作垂首沉默状,心中略有不祥之感,忙询之值班人员,答曰郑振鹏先生不幸辞世矣。闻听之下,心室震颤,心区隐隐作痛,尤其想到两日前还在听其授课,聆其宏论,而昼夜之间,竟然阴阳两隔,世事无常,天意难测,竟至于此,不禁怆然。追思会上,余虽为男儿,然情不自禁,悲伤失度,以泪洗面,流露的是真情感,抒发的是大悲哀。时至今日,弹指之间,三年已逝,风华渐衰,世情已老,然偶一念及先生,其音容笑貌,宛在目前,不禁怦然心动,黯然伤怀。扪心自省,余所深深怀念者,既是一代大家的清贵人品,一代名士的满腹才学,也是一个风雅渐远的时代。

H 读史侧翼 列绍义 古代最后一次“高考”



古代高考众生相

看几遍军旅作家王维的《末代状元张謇》,也没有弄明白作者为什么把张謇说成是末代状元。因为在张謇后面还有骆成骧、夏同龢、王寿彭、刘春霖四位状元,末代状元应该是刘春霖。

江苏海门市长乐镇(即今常乐镇)人张謇成为光绪二十年(1894年)甲午科的状元,当年的榜眼是湖南省茶陵县人尹铭绶,探花是湖南长沙人郑沅。这次考试后的1895年,荣禄、陶模等人上书变通武举,建议以武学堂取代武举培养和选拔人才。也就是在这一年,李提摩太提出在科举考试中增加新的科目。他认为:“中国科目,意美法良,不可废也。”但“惟题目不广,只讲本国之事,不知各国治平之法”,应该改革。

第二年,即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,由徐桐、启秀、李文田、唐景崇任主考官,科举考试仍在进行,四川资中人骆成骧成为当年状元,浙江黄岩人喻长霖、湖南省湘乡县新安乡三十四都(今双峰县三塘铺镇)人王龙文分别是榜眼和探花。光绪二十三年(1897年)十一月,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考试时设立经济特科,选拔“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,或熟谙中外交涉事件,或算学律学,擅绝专门,或格致制造,能创新法,或堪游历之选,或工测绘之长”的人才。康有为也在这一年撰写了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析》一文,指出用八股取士,致使出现“巍科进士,翰苑清才,而竟不知司马迁、范仲淹为何代人,汉祖、唐宗为何朝帝者,若问以亚非之奥地、欧美之政学,张口瞪目,不知何语矣”。但他们说归说,科举考试并没有停止。

光绪二十四年(1898年),贵州麻哈州(今麻江县)人夏同龢中戊戌科状元,湖南桂阳莲塘大湾人夏寿田是榜眼,浙江德清人俞陛云是探花。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,两广总督陶模率先提出“废科举以兴学校”,作为“图存四策”之一。戊戌变法时,康有为建议:“请勿下部议,特发明诏,立废八股。”清廷并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,慈禧太后只是重新恢复了被废止的经济特科。1903年癸卯科考试正常进行,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,由孙家鼐等四人任主考官的科举考试。山东潍县(今潍坊)人王寿彭高中

状元,山东莱州人左需、贵州遵义人杨兆麟分别中榜眼和探花。

紧接着的光绪三十年(1904年),以裕德、张百熙、陆润庠、戴鸿慈为主考官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,河北省肃宁县人刘春霖一举夺魁,成为清朝末代状元,广东清远城人朱汝珍、广东番禺人商衍鎏分别成为末代榜眼和探花。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(1905年9月2日),直隶总督袁世凯、盛京将军赵尔巽、两广总督张之洞、两江总督周馥、两广总督岑春煊和湖南巡抚端方会奏《请废科举折》。指出“科举一日不停,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,以分其砥砺修之志”。呼吁停止科举已是迫在眉睫之事。清廷接受了来自举足轻重的南北封疆大吏的建议,决心废除科举考试,以达到延续自身统治的目的。自此为止,具有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宣告结束。

值得一提的是,这中间有的人一边高喊废除科考,一边又不停地参加着科考。徐世昌和袁世凯曾誓言废除科考,但徐世昌还是参加了科考,并中光绪十二年(1886)的进士。好在袁世凯并没有放在心上,两人关系依然很好,在玩弄清政府和孙中山的道路上,相互协助,一唱一和。相比之下,梁启超就没有这么幸运了,他和吴稚晖等人约好不参加考试,但梁启超还是在父亲梁宝瑛和老师康有为陪同下分别参加了1890年和1895年的会试,最后虽然因为主考官徐桐以广东举人考卷中“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”为由没有录取,但还是导致了吴稚晖和梁启超终生不相往来的最后结局。

H 写食主义 乔北写 清淡萝卜

菜园里的萝卜成熟了,壮壮实实地立在那儿,犹如乡下丰腴腰身的农妇,很有精气神儿。拔一个洗净,水灵灵的让人忍不住咬上一口,一股甜脆透凉的感觉瞬间荡漾全身。

早在两千年前,我们的祖先就已知萝卜之美,《诗经》中有“采葑采菲,无以下体”的诗句,“菲”指的就是萝卜。劝告人们不要因其叶的不好看而忽视了其根茎的美味。

汪曾祺在散文《萝卜》中谈到台湾女作家陈怡真来北京拜访他,汪老亲自下厨,其中有一道菜就是烧小萝卜。文中说:“她吃了赞不绝口。那当然是不难吃的;那两天正是小萝卜最好的时候,都长足了,但还很嫩,不糠;而且我是用干贝烧的。她说台湾没有这种水萝卜。”

梁实秋有意思,还能从一钵萝卜汤中得出启示,他在《雅舍谈吃》中说杨太太做的排骨萝卜汤堪称一绝:“排骨酥烂而未成渣,萝卜煮透而未变泥,汤呢?热、浓、香、稠。大家都吃得直吧嗒嘴。”从这道萝卜汤中,梁先生悟出了为文之道,只须做到言中有物即可。其实做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?不能华而不实。

另一个人是弘一法师,竟把吃萝卜与佛道修行联系起来。有一天,夏丐尊去拜访他,吃饭时,法师只一碗白粥配一碟咸萝卜,夏丐尊偶尔一尝萝卜太咸了,想跟法师换换,法师不肯,说,咸有咸的味道,淡有淡的味儿。此话甚妙,人生咸淡两由之,个中滋味只须人去品味。

小时候,物质匮乏,到了秋冬时节,萝卜就成了饭桌上的主打菜,天天吃,吃到后来闻着萝卜味儿就反胃。奶奶生前吃饭时最常说的一句话:“肉是好东西,猪从萝卜地里过一趟,那萝卜都好吃些。”

我至今仍然认为,猪肉烧萝卜是人间美味。母亲做的萝卜干炒腊肉让我百吃不厌。将萝卜干用温水泡后切成段,腊肉清洗干净,上蒸锅隔水蒸熟后切成薄片。腊肉片炒至出油,随后加入萝卜干、蒜粒、红尖椒、豆豉,翻炒入味后即可出锅。萝卜干吸收了腊肉的油脂,吃起来荤香四溢,腊肉煸炒过后不再油腻,反而更有韧劲,加入的红尖椒和豆豉,非常香辣开胃。